

運用互文性理論解讀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以比較面與影響面為論述核心

黃忠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授

摘要

南宋呂祖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是《詩經》學史上的名著，此書被歸為尊《序》派著作。稍後於呂氏的戴溪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之作，就書名觀之，其書應該為呂書之附庸，整體質性與呂書無異。然而實際檢視戴書，卻又可發現戴溪在著書體例與說解方式上與呂書大異其趣，若將呂戴二書同歸為宋代說《詩》中的舊派著作，實與真相不合。本文運用西方的互文性概念，解讀《續呂氏家塾讀詩記》所受自歷時性與共時性「前文本」的影響，指出其表現出的特質傾向新派，其所受到的主要影響乃在宋代新派的《詩經》學文本，傳統《詩經》漢學與呂祖謙的著作對其影響反而不大，但因戴溪仍以探索詩中蘊藏的聖人深意為依歸，所以本文也要將戴書的新舊標誌作一說明。

關鍵詞：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互文性

壹、前言

在宋代《詩經》學史上，呂祖謙（1137—1181）的《呂氏家塾讀詩記》（以下視情況得簡稱為《讀詩記》）屬遵守《序》說一派中的名作。呂氏出身簪纓世家，家族不僅以官宦名世，在學術界中亦頗為知名。在《宋元學案》中呂氏一門即被選入者超過十七人。¹呂祖謙雖然以恩蔭進入官場，但是幾年後取得進士功名，便開始擔任文教方面的官職。直至過世前幾年，呂祖謙仍然主持著當時朝廷的編修工作。呂祖謙與當時的學者交遊密切，顯然也頗有聲望。這一點可以由他促成學術史上有名的「鵝湖之會」，以及屢次為朱熹（1130—1200）、陸九淵（1139—1193）學術爭端作調人之事可見。《呂氏家塾讀詩記》的撰作起於呂祖謙生命最後一年之時，至過世時本書寫至〈公劉〉之篇。剩下的部分就由呂祖謙的弟弟呂祖儉，依照呂祖謙生前的研究資料、成果加以接續完成，²所以《呂氏家塾讀詩記》仍可稱為一部完整之作，並不存在缺漏的問題。雖然如此，此書後來有戴溪（生卒年不詳）為之續作，書名就叫《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以下視情況得簡稱為《續讀詩記》）。

戴溪在南宋也是頗有名望的人物。孝宗淳熙五年（1178），戴氏奪得省試第一，之後屢任各部官職，升遷頗快。比較特殊的職位是寧宗開禧年間（1205—1208）擔任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曾為太子講學。最後的官位是代工部尚書，而後以龍圖閣學士致仕。

¹ 王梓材：「梓材謹案：謝山《荀記》：「呂正獻公家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獻子希哲、希純為安定門人，而希哲自為《滎陽學案》。滎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弼中，別見《和靖學案》。滎陽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為《紫微學案》。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為《東萊學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滎陽長子好問，與弟切問歷從當世賢士大夫遊，以啓紫微，不能不為之立傳也。」《宋元學案》（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卷19，〈范呂諸儒學案〉，頁8—9。郭麗娟：「一門之中被選登學案者如此之多，若無深厚之家學淵源是無法達到的，況此中尚漏列五人；即《東萊學案》中呂祖謙之子延年，從子喬年、康年。此外，未被列入之呂希積、呂好問，其學問成就亦足以名列學案，故應為七世，二十二人。」《呂祖謙詩經學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頁14。

² 呂祖儉：「先兄己亥之秋，復脩是書，至此而終。自〈公劉〉之次章訖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判定。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末次先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有所損益，姑從其舊，以補是書之闕云。」《呂氏家塾讀詩記》，《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經部，第73冊，卷26，頁709：28b。

戴溪在《宋史》中有傳，³在《宋元學案》中列入〈止齋學案〉。⁴

在學術史上，戴溪的聲譽無法望及呂祖謙之項背，但是還原至南宋初期，兩人的身份地位，甚至在學術圈中的名望或許沒有太大的差距，在某種程度來看，甚至可以放在同一天平上。⁵呂祖謙與戴溪的生存年代是有所交集的，雖然戴溪明顯比呂祖謙晚上一輩，但以戴溪的身份地位來看，以「續」書的名義來撰寫研究著作，的確是很值得玩味的事情。

3 《宋史·儒林傳》：「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田，諭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于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為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溪久於宮僚，以微婉受知春宮，然立朝建明，多務祕密，或議其殊乏骨鯁云。」《宋史》，卷434，《正史全文標校讀本》（台北：鼎文書局，1980年），第4冊，頁3465。

4 〈止齋學案·文端戴岷隱先生溪〉：「戴溪，字肖望（雲濠案：沈光作先生《春秋講義序》，稱先生字少望），永嘉人。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先生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為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先生講《中庸》、《大學》，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語》、《孟》、《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賜諡文端。（參史傳。雲濠案：謝山《笥記》：「先生著有《易經總說》二卷，《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詩說》、《續讀詩記》各三卷，《春秋說》三卷，《通鑑筆議》三卷，《石鼓》、《論語》、《孟子答問》各三卷，《岷隱文集》，復雒對《清源志》。」《宋元學案》，卷53，頁109。

⁵ 《四庫全書總目·十先生奧論四十卷》：「不著編輯者名氏，亦無刊書年月。驗其版式，乃南宋建陽麻沙坊本也。書中集程子、張栻、楊時、朱子、張栻、呂祖謙、楊萬里、胡寅、方恬、陳傅良、葉適、劉穆元、戴溪、張震、陳武、鄭澁諸人所作之論，分類編之，加以註釋。」《四庫全書總目》（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第7冊，卷187。基本上，戴溪「所作之論」能與程子、朱子、呂祖謙等合為一集，學術水平、社會地位等不至於差距過大。

由《呂氏家塾讀詩記》的成書經過來看，戴溪若要為續寫《呂氏家塾讀詩記》，或許可以由〈公劉〉以下開始進行，以統一全書的體例與意旨。不過戴溪顯然沒有採用這樣的途徑來承續《讀詩記》。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提到《續讀詩記》：「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為名，其實自述己意，亦多不用〈小序〉。」這樣的意見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接受：「溪以《呂氏家塾讀詩記》取毛《傳》為宗，折衷眾說，於名物訓詁最為詳悉，而篇內微旨，詞外寄託，或有未貫，乃作此書以補之，故以『續記』為名；實則自述己意，非盡墨守祖謙之說也。其中如謂〈標梅〉為父母之擇壻，〈有狐〉為國人之憫鰥，〈甘棠〉非受民訟，〈行露〉非為侵陵。故《書錄解題》謂其「大旨不甚主〈小序〉。然皆平心靜氣，玩索詩人之旨，與預存成見，必欲攻毛、鄭而去之者，固自有殊」。《溫州志》稱溪『平實簡易，求聖賢用心，不為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於此書可見一斑矣。原本三卷，久佚不傳。散見於《永樂大典》中者，尚得十之七八，謹綴緝成帙，仍釐為三卷。」⁶影響所及，後來的《詩經》學史或要籍評介之類的敘述，也是如此描述《續呂氏家塾讀詩記》的內容與地位，這樣的描述與評斷顯得極為浮面，甚至有人還嚴重誤讀《直齋書錄解題》與《四庫提要》，斷章取義地將呂戴二書的特點合併為戴書所獨有。⁷不過作為提要型的評介，大概也很難深入探索文本的核心價值與其存在意義，本文則從西方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論觀察戴溪《續讀詩記》所受自前《詩經》文本的影響，至於全書的解經特質與評價，筆者自當

⁶ 《四庫全書總目》，第1冊，卷15，頁342。按：文中所云《溫州志》即《溫州經籍志》，為清儒孫詒讓所作。

⁷ 林葉連：「此書以毛《傳》為宗，折衷眾說，於名物訓詁尤為詳悉。謂呂氏於字訓章旨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為名；其實自述己意亦多，不盡用〈小序〉。例如〈有狐〉為國人憫鰥夫；〈標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婿之辭；其新說若此。」《中國歷代詩經學》（台北：學生書局，1993年），頁255。按：所謂「以毛《傳》為宗，折衷眾說，於名物訓詁尤為詳悉」之語原用於《讀詩記》，林氏誤用於《續讀詩記》。蔣見元、朱杰人：「呂祖謙的《讀詩記》對北宋到南宋出的《詩》學作了總結，對名物訓詁徵引眾說，比較詳博，但對詩旨的理解一仍《詩序》，頗嫌疏略。戴書則專講詩義而不及訓詁，正是為了補呂書之不足，故名曰《續呂氏家塾讀詩記》。戴氏論詩，其基本觀點與呂氏一樣，以《詩序》為宗，但他並不機械地照抄《詩序》，而是經過自己的消理解，或加以闡釋，或予以補充，或給以修正，有些篇章別出己說。……戴氏《續讀詩記》多有曲解詩義，附會《詩序》的地方，亦須引起注意。」《詩經要籍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43—44。夏傳才、董治安：「戴氏以為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以毛《傳》為本而折衷眾說，於名物訓詁最為詳表，但於詩篇中的微旨，詞外的寄託，尚未貫通發明，所以著此書以補之，故曰『續記』。實際上，本書是著者發表自己的見解，並不完全依從呂祖謙之說。例如，他說〈標有梅〉是父母擇壻，〈有狐〉是國人憫鰥，〈甘棠〉不是受民訟，〈行露〉不是有侵陵等等，與〈小序〉不同，與呂祖謙不同，更與朱熹《詩集傳》的詩說相左，力圖詩說能發揮聖賢之用心。」《詩經要籍提要》（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8月），頁356—357。

另撰專文討論。

貳、互文語境下的戴溪《續讀詩記》：戴溪與宋代新派說《詩》的相同點

僅從書名來看，將《續呂氏家塾讀詩記》視為《呂氏家塾讀詩記》的延伸、承續，是相當自然的事，若非如此，反而事顯蹊蹺。然而，讀者若實際翻閱兩書，又立可發現，戴書不僅在著書體例上與呂書有異，對於傳統注疏的態度與訓詁的方法、詩旨的訂定等，也都有明顯的的差別性，如何解釋這種現象？以下藉由互文性的觀念來解釋造成《續讀詩記》與《讀詩記》內外皆有差異的原因，並以此探測出早先呂戴二書相關敘述的產生盲點。

按互文性也有人譯作「文本間性」、「文本指涉」，意指沒有一個結構主義的文學作品可以片面地去看，每一個事物在任何時候，都涉及其他的事物；所有的思想和傳統都可以合法地變成一個文本的一部分；每一個文本都可以通過新的閱讀而發生別的一些聯想；各種文本是相互聯繫的。⁸作為一個重要的批評概念，互文性出現於二十世紀60年代，隨即成為後現代、後結構批評的標識性術語。現在，互文性概念不僅適用於文學文本上，也可以看做是廣效性的閱讀理論，因為如今所謂互文性批評，就是放棄早期人們僅僅關注作者與作品關係的傳統批評方法，轉至寬泛語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⁹

在西方，互文性的想法早已廣泛存在，但「互文性」作為一種明確概念與學術術語，最早是由法國學者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所發明，¹⁰克里斯蒂娃於1969年在其《符號學》中提出：

橫向軸（作者—讀者）和縱向軸（文本—背景）重合後揭示這樣一個事實：一個詞（或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詞（或文本）的再現，我們從中至

⁸ 詳 [美] 庫茲韋爾 (Kurzweil, E.) 著，尹大貽譯：《當代法國思想》（台北：雅典出版社，1989年），頁209。

⁹ 陳永國：「所謂互文性批評，就是放棄那種只關注作者與作品關係的傳統批評方法，轉向一種寬泛語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這種研究強調多學科話語分析，偏重以符號系統的共時結構去取代文學史的進化模式，從而把文學文本從心理、社會或歷史決定論中解放出來，投入到一種與各類文本自由對話的批評語境中。」詳陳永國：〈互文性〉，<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CulturalWorkshop/culturestudy/theory/01.htm>，瀏覽日期：2009年4月27日。

¹⁰ 按：克里斯蒂娃原是保加利亞人，1965年移居法國，她具有多重身份，可以稱為一位多產且理論複雜多變的精神分析學家、語言學教授、符號學家、小說家、修辭學家、社會活動家，也是一位中國文化的推崇者。詳羅婷：《克里斯蒂娃》（台北：生智出版社，2002年），〈序〉，頁1。

少可以讀到另一個詞（或一篇文本）。在巴赫金看來，這兩隻軸代表對話（dialogue）和語義雙關（ambivalence），它們之間並無明顯分別。是巴赫金發現了兩者間的區分並不嚴格，他第一個在文學理論中提到：任何一篇文本的寫成都如同一幅語錄彩圖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轉換了別的本。¹¹

克里斯蒂娃在此提出了兩個軸向的觀念，而這兩個軸向說明了一個文本的形成是如何的複雜，並非我們一廂情願的以為是完全由作者一人所創造。「每一個文本都把自己建構為一個引用語的馬賽克，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與改造。」¹²即每一個文本中都包含了其他文本涉及的因素，每一個文本都不可能是一個與外界絕緣的封閉的語言體系，而是與其他文本有著某種程度的聯繫。因此，正如一個人和他人建立廣泛的聯繫一樣，一篇文本不是單獨存在，它總是包含著有意無意中取之於人的詞和思想。¹³

克里斯蒂娃於1973年獲得巴黎大學的博士學位，在博士論文《詩歌語言的革命》裡，克里絲蒂娃進一步發展了互文性的概念。互文性的觀念自從克里斯蒂娃提出後，經過幾個不同時期的演變，拓展增衍許多新的意涵，透過研究者的整理，大約可分為廣義的與狹義的兩種。狹義觀點認為，互文性是指一個文本與存在於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間所構成的一種有機聯繫，其間的借鑑與模仿是可以通過文本語言本身驗證的，該觀點的代表人物是以研究結構主義敘事學而聞名的吉拉爾·熱耐特（Gérard Genette, 1930-）；廣義觀點認為，互文性是指文本與賦予該文本意義的所有文本符號之間的關係，它包括對該文本意義有啟發價值的歷史文本及圍繞該文本的文化語境和其他社會意指實踐活動，所有這些構成了一個潛力無窮的知識網絡。這種觀點的代表理論家是以強調解構批評而著名的羅蘭·巴特（Barthes, Roland, 1915-1980）、德里達（Derrida, Jacques, 1930-2004）和克里

¹¹ [法] 克里斯蒂娃：《符號學，語意分析研究》，頁145。轉引自 [法] 蒂費納·薩莫瓦約（Tiphaine Samoyault）著，邵焯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4。按：互文性原是西方文學理論界由結構主義向後結構主義轉向的過程所提出的一種文本理論。「互文性」概念雖由克里斯蒂娃提出，但互文性思想卻早已存在，其源頭可以追溯到瑞士的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美國的T. 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和俄國的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1895-1975）。詳李玉平：〈互文性批評初探〉，《文藝評論》，2002年第5期，頁11。董希文：〈文本與互文本〉，《文學文本理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228。

¹² 引文見馮壽農：《文本·語言·主題》（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8。

¹³ [法] 施耐德《竊詞者》：「文本從何而來？原有的片段、個人的組合、參考資料、突發事件、留存的記憶和有意識的借用。人物從何而來？零碎的認識、合併的形象、同化的特徵性格，所有這般（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組成了人們稱之為『我』的虛構。」轉引自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焯譯：《互文性研究》，頁30。

斯蒂娃等人。¹⁴筆者在此僅借用互文中所強調的一些重要觀念，並不涉及互文所牽涉的歷史、學派之爭。由克里斯蒂娃所提示的互文性概念中，我們可以得知幾個重點：其一，一個文本的形成不能光從作者——作品單一的方向考察，而是包括了文本與其他文本之間的關係：與之前的文本（縱向歷時的軸），還有與當時時空環境背景之間的關係（橫向共時的軸）。所以，要理解一個文本，不能孤立地來看待這個文本，因為在一個文本中，又不同程度地以各種能夠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的文本，包括先前的文本和周圍文化的文本。其二，對於文本意義的理解、詮釋，主要掌握在讀者身上，因此互文性理論重視讀者（詮釋者）的作用。文本載有它自己的記憶，而每一個人的記憶與文本所承載的記憶既不可能完全重合，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對所有互文現象的解讀——所有互文現象在文中達到的效果——勢必包含了主觀性。¹⁵筆者以為，上述的理論有助於理解戴溪《續讀詩記》何以在從裡到外都與呂祖謙《讀詩記》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

首先，從橫向的共時性與縱向的歷時性觀點來檢視《續讀詩記》，我們會發現，縱向的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關係（即《續讀詩記》與《毛詩》、《讀詩記》之間的關係），反而不如橫向的文本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即《續讀詩記》與當時流行的講章體，以及與自由詮釋三百篇的風氣之間的關係）那般密切。關於縱向的聯繫方面，戴溪對於《詩序》的解題抱持的是客觀的態度，他不像呂祖謙那般遵守《序》說，而是以詩文為準來驗證《序》說，¹⁶這一點和呂祖謙有極大的不同，又由於戴溪的著書重心如前引《四庫提要》所言，在「篇內微旨，詞外寄託」這一部分，所以他對於毛鄭訓詁的舊有成績也並不看重。在此要說明的是第二個面向，即戴溪《續讀詩記》特有的詮釋法與當時學術環境之間的關係。

《續讀詩記》有一個訓詁方式與尊《序》的呂祖謙不同，即戴溪往往運用其個人的聯想來創造新說，¹⁷這樣的方式為毛、鄭所無，然而若從當時整個時

¹⁴ 董希文：《文學文本理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234。

¹⁵ 蒂費納·薩莫瓦約：「互文性的矛盾就在於它與讀者建立了一種緊密的依賴關係，它永遠激發讀者更多的想像和知識、記憶、個性之間的差別。這兩者之間天衣無縫的一致是不可能的，所以對互文的感知可能會是變化的和主觀的。」《互文性研究》，頁81。

¹⁶ 僅以《續讀詩記》直接指出《序》非的文字為例，就有〈召南·鵲巢〉、〈邶風·北門〉、〈衛風·芄蘭〉、〈王風·大車〉、〈鄭風·女曰雞鳴〉、〈風雨〉、〈陳風·衡門〉、〈墓門〉、〈小雅·鹿鳴〉、〈采芣〉、〈周頌·天作〉、〈昊天有成命〉、〈豳〉、〈敬之〉、〈魯頌·閟宮〉等十五處之多，分見卷1，頁5b；15a-b；23b-24a；27b-28a；30b-31a；33a；51a；52a；卷2，頁1a-b；45b-46a；卷3，頁31a-b；31b-4a；34b-35a；37a-b；頁41b-42a。

¹⁷ 戴溪透過聯想力以創造新說的可見《續讀詩記》之論〈陳風·墓門〉，卷1，頁52a；論〈曹風·候人〉，卷1，頁56a；論〈小雅·小宛〉，卷2，頁22b-23b；論〈北山〉，卷2，頁32a；論〈車牽〉，卷2，頁39b-40b；論〈采芣〉，卷2，頁43a-44b。

代風氣來說，則戴溪與毛、鄭之間的「異」正好是他與當時所謂新派學者之間的「同」。筆者在此所謂的「新派」之說是指相較於那些善用傳統的解釋成果（漢唐注疏）的學者而言。從《詩經》學史的角度而言，歷來研究者都指出了宋代《詩經》學與漢唐舊學的差異，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表現在對《詩序》、毛《傳》、鄭《箋》的態度上，如《四庫提要》說：「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¹⁸四庫館臣的說法偏向於結果論，若考慮到詮釋的過程，即解《詩》的方法，則宋代《詩》說「新變」的特點可以更為全面地展現。若以南宋早期《詩經》發展而論，鄭樵（1103—1162）、王質（1135—1189）是主要的新派代表，而他們為後人視為「新」的主要關鍵在於反對《詩序》之說最力。依筆者之見，鄭、王二人的新還展現在解《詩》的方法上，尤其是王質。以鄭樵為例，雖然他的解《詩》之作遺佚大半，但仍可從其殘存的文字中窺見他對毛、鄭的基本態度。鄭氏於〈寄方禮部書〉云：「《詩》之難可以意度明者，在于鳥獸草木之名也。……學者所以不識《詩》者，以大小《序》與毛、鄭為之障蔽也。」¹⁹由此可知鄭樵為《詩》疏解時反對毛、鄭的基本立場。與鄭樵立場相反的周孚說他：「決裂古訓，橫生臆解，實汨亂經義之渠魁。南渡諸人，多為所惑。」四庫館臣也說他：「博洽傲睨一時，遂至肆作聰明，詆謫毛鄭。其《詩辨妄》一書，開數百年杜撰說《詩》之捷徑，為通儒之所深非。」²⁰再加上《詩辨妄》與《六經奧論》都屬於論說體式，前者為駁論體，後者為正論體，²¹用論辨的方式解《詩》，拋棄傳統的訓詁法，如此而得出的嶄新見解，由字詞訓詁至大義闡釋，其證據力量與效力難免會被高度質疑。至於王質，在《詩總聞》中雖然也知襲用毛、鄭之說，但數量有限。據研究者之統計，王質引用毛《傳》舊說共計33篇，引用鄭《箋》之說共計13篇，其中又有3篇重複。襲用毛《傳》之說共計45條，襲用鄭《箋》之說共計14條。²²透過這樣的數據，可知王質對傳統解釋並不看重。此外我們也要

¹⁸ 《四庫全書總目》，第1冊，頁335。

¹⁹ 鄭樵：《夾漈遺稿》（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據《藝海珠塵》本排印），卷2，頁12—13。

²⁰ 分見《四庫全書總目》，第2冊，頁831；第5冊，頁3166。按：以上兩條評論分見「《爾雅註》（鄭樵撰）」、「《蠶齋鉛刀編》（周孚撰）」條。

²¹ 詳郝桂敏：《宋代詩經文獻研究》，頁204—213。

²² 關於王質襲用毛、鄭舊說的情形，見陳昉昉：《王質詩總聞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頁35—40。按：陳氏所謂王質說與毛《傳》、鄭《箋》同，係採最寬鬆的標準，如〈小雅·節南山〉「師氏」一詞，毛《傳》解「師」為「大師，周之三公」，王質解「師」為「官」，陳氏謂王質說同毛《傳》；又如〈小雅·大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之句，《箋》云：「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齊孰，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為利。」王質：「不

注意王質的解《詩》法，近人在分析王質的解《詩》法時，曾提出了所謂的「以賦體直解」，即只憑詩文表面的字意解《詩》，不顧毛、鄭舊說如何。其訓解的結果往往與舊說相異，但難免流於望文生義。²³再者，王質說《詩》還有太過坐實、漫衍旁出的歧說等缺失，²⁴是以《四庫全書總目》謂其「冥思研索，務造幽深，穿鑿者固多，懸解者亦復不少」，²⁵這些對王質解《詩》的評語放在戴溪的身上也是合適的，所謂望文生義、漫衍旁出等解詩缺陷，也發生在戴溪的《續讀詩記》身上。

以上所舉鄭、王二人屬於南宋早期說《詩》新派的代表，而從他們對於毛、鄭的態度及訓解《詩》文的方法中，約略可見戴溪與鄭、王，或者說與新派的學者較相近。若以南宋時代的治《詩》學者而論，《續讀詩記》整體的表現，在精神上是偏向於新派陣營這邊的。南宋中期之後的研《詩》之士中，朱熹弟子輔廣（生卒年不詳）與陸九淵門人楊簡（1140—1225）都是新派說《詩》陣營中的重要角色。輔廣對於其師朱熹的學問欽佩不已，其《詩童子問》一書便是尊朱一派中的名著。此書得名之由，胡一中的〈序〉說地很清楚：「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尊其師說，退然不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而輔廣在書中也對於朱子之說未完備之處多所補充。²⁶輔廣並不將毛氏一家之說視為解《詩》的唯一權威，若其他解釋可通，輔廣亦存之不廢。作為朱子的及門弟子，輔廣閱讀、解釋經書，自然受到朱子的影響，尤其是用理學家式的眼光來說《詩》。我們發現，在八卷本的《詩童子問》中，輔廣的解經的方式與當時的學者相似，即善於說理，以指陳詩中的大意为主，至於名物訓詁、偏詞僻字的解說則為其次。輔廣對於毛、鄭之說的批評雖然不多，仍可看出他對毛、鄭二氏的基本態度。如云穿鑿、增字解經等。²⁷另一方面，本著孔子「思無邪」之旨，反覆

穫，不及穫者也。不斂，不及斂者也。遺棄，所棄者也。滯穗，所留者也。今北方刈穫，弱婦幼童，隨·掇拾于後，亦足度日。南方亦謂之拾○，但不多爾。」陳氏以王質之解「不穫」、「不斂」為同於鄭《箋》。假若我們用比較嚴格的標準來檢覈王質之訓釋，則其同於毛鄭者，數量還會少一些。

²³ 詳陳昫昫：〈王質詩經學探微（二）〉，《湖北文獻》第118期（1996年1月），頁6—8。

²⁴ 詳簡澤峰：〈王質《詩總聞》一書及其詮釋觀〉，《彰雲嘉大專院校聯盟2006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12月），頁463—465。

²⁵ 《四庫全書總目》，第1冊，頁338。

²⁶ 胡一中之語轉引自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108，頁580。王禕謂《詩童子問》：「其說多補朱《傳》之未備。」《經義考》，卷108，頁580。

²⁷ 此二處說的都是鄭玄的訓解，見《詩童子問》，《四庫全書》，第74冊，卷4，頁25b；卷6，頁11a。

發明以闡揚《詩》說的楊簡，²⁸從受學於陸九淵、具理學家的背景，不難推知他說解經文的特質。楊簡重在詮解發揮《詩》文之大義，對他來說，訓詁的工作只是闡述經文的工具而已。從總體上來看，楊簡對於《毛詩》抱持質疑的態度，不僅認為《詩序》是東漢衛宏所作，連《毛詩》的傳承也加以懷疑。依其判斷，毛氏自云其學傳自子夏，而子夏在儒學的道統傳承裡，地位不高，《論語》中也暗示他是小人儒，作為子夏後學的毛公，所得自然亦非孔門之真傳，楊簡由此推知《毛詩》之說不必全然可信。²⁹值得注意的是，輔、楊二氏的著作體式都屬通釋體，而通釋體與論說體的差別主要在於它必須面對305篇每一詩文，無法作選擇性的論述。因此，直接面對字詞訓詁成了通釋體不可避免的課題。即使如此，輔、楊二氏仍只挑揀有問題，或具關鍵性的字詞來訓解。與毛、鄭不同的是，通釋體的訓解方式採取一種說明大義的方式，而不是仔細辨析字詞內涵，從聲音、字形上去追尋字意。因為只說明大義，所以往往有很多字詞的訓解釋產生了望文生義的弊病。如輔廣解〈周南·芣苢〉「薄言采之」之「薄」為「少」：「薄，猶少略也。雖薄言采之，而采之多以至於袷與禰焉。」³⁰此一「薄」字按照毛、鄭之解說，只是語辭，無意義，但輔廣無視於毛、鄭的舊解，只從表面上的意思去揣想「薄」字之意，其訓詁方式確實失之簡單。又如楊簡訓〈曹風·蜉蝣〉「蜉蝣掘閱」之「掘閱」為：「蜉蝣掘糞土而出，覩陽明。閱有觀覩之義，喻群小識見卑污之甚也。」楊簡對於「掘閱」的基本解釋與毛、鄭之說相同，但所比喻者有異，³¹對於「閱」字的解釋有望文生義之嫌。實則「閱」當讀為「穴」，是「穴」字的假借，而「掘」為穿之義。因此，「掘閱」意為「穿穴」，指蜉蝣始生時，穿穴而出的樣子，³²和所謂群臣的識見卑污無關。從輔廣與楊簡解《詩》的體式特點上，我們約略可以看出出輔、楊二氏與傳統毛、鄭舊說不同的解釋取向，而這樣的情形，在戴溪的身上也可以見到。

²⁸ 《四庫提要》以為《慈湖詩傳》「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反覆發明」。《四庫全書總目》，第1冊，頁340。

²⁹ 詳《慈湖詩傳》，《四庫全書》，經部，第67冊，卷前〈自序〉，頁2b-3a；4b-5a；卷1，頁5a-5b。

³⁰ 《詩童子問》，卷1，頁9a。

³¹ 楊簡之說見《慈湖詩傳》，卷10，頁1a。毛《傳》：「掘閱，容閱也。」鄭《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群臣朝夕變易衣服也。」

³² 關於「掘閱」的解釋，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15，頁436。

參、從互文性理論看影響《續讀詩記》的因素

無論從戴溪之前，還是與戴溪相近的學者來論，《續讀詩記》的詮釋方法都與新派的陣營較為接近，反而與堅守毛鄭舊說的學者相異較大，呂祖謙就是最直接的一個對比。尊重毛《傳》、鄭《箋》的訓詁成績，遵守《詩序》之解題，是呂氏讀《詩》解《詩》的基本信念，³³雖《讀詩記》偶亦有超出《序》說的創新之見，但如同研究者所言，「只是細枝末葉而已」，³⁴守舊的成分甚為濃厚。反觀戴溪著書雖以《續讀詩記》為名，卻不僅避開了毛鄭的訓釋成果，對於《詩序》之說也是能修正則不確守。在此，我們還可以舉另一個時代相近的學者嚴粲（1197—？）來說明。嚴粲的《詩緝》乃南宋「舊派」《詩》說中的壓軸之作，³⁵將《詩緝》歸入舊學一派中，筆者以為可從兩方面來解釋。首先是《詩緝》中帶有濃厚的傳統《詩》教觀，如堅持聖人的解釋觀點及對《詩序》「美刺」之說的繼承。其次是解《詩》方法上對毛、鄭舊說的重視及傳統解經方法的繼承，包括如以經解經、以傳解經的詮釋法。筆者曾舉《詩緝》中嚴粲針對毛、鄭之說的調停、辨析為例，藉此說明嚴粲的解《詩》特質，以為：毛說、鄭說作為最早的訓詁解經說法，一直為經學家所重視，但是毛、鄭二說難免有衝突之處，傳統的解經者面對此一情況，必須調解或辨析毛、鄭之說，這是他們必要的解經步驟，嚴粲也是如此。從這一點來看，嚴粲的經學家氣息更重，也更能凸顯他與當時治《詩》學者的不同，不以主觀的意見解經，使用的是強調客觀、重視古說的解經法。所以嚴氏可謂真正的「古之學者」。³⁶因此，我們又從嚴粲的例子中再次看到了戴溪與所謂「舊派」學者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尤其是其與呂祖謙之間的差異，和時代學術風尚有密切的關係。從互文的角度的來說，影響

³³ 朱子甚至說：「人言何休為《公羊》忠臣，某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佞臣。」《朱子語類》（台北：華世出版社，1987年），第8冊，卷122，頁2950。

³⁴ 引文為趙制陽語，趙氏又云：「如〈邶風·簡兮〉、〈鄘風·柏舟〉、〈小雅·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大雅·文王有聲〉等篇，其否定《序》說，均言之有據。惟此類質疑之文，嫌其太少，不足以影響全局。」《詩經名著評介》第三集（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9年），頁216。

³⁵ 《四庫提要》將《詩緝》與《呂氏家塾讀詩記》相提並論，其評介《詩緝》云：「是書以呂祖謙《讀詩記》為主，而雜採諸說以發明之，舊說有未安者，則斷以己意。……深得詩人本意。至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考證尤為精核。宋代說《詩》之家，與呂祖謙書並稱善本，其餘莫得而鼎立，良不誣矣。」《四庫全書總目》，第1冊，頁344。姚際恆（1647—1715）云：「嚴坦叔《詩緝》，其才長於詩，故其運辭宛轉曲折，能肖詩人之意；亦能時出別解。第總囿於《詩序》，間有齟齬而已。惜其識小而未及遠大，然自為宋人說《詩》第一。」《詩經通論》，《姚際恆著作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年），第1冊，頁7。按：《詩緝》採朱子之說最多，《提要》謂是書以呂祖謙《讀詩記》為主，非是。

³⁶ 詳拙著《嚴粲詩緝新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頁66—67。

《續讀詩記》的因素，縱向軸的傳統文本之說似乎頗為輕微。且不論早期的文本，就以呂氏《讀詩記》作為比較，《續讀詩記》「承續」呂書的成份到底有多少，已經讓人存疑，至少我們可以大膽地說，「承續」的內容遠低於戴溪自己發明的內容。根據筆者所作的統計，《續讀詩記》仍有67.79%的比率與《詩序》之說相同，雖然，這個「同」的背後卻有著「去除首句」的焦慮存在。相反的，橫向軸的因素則在戴溪身上顯然可見，尤其從他面對毛、鄭舊說的態度，及聯想增出的訓解方法，還有望文生義的直推訓詁，都與當時代流行的學風相合。除了這些與新派學者相似之處，筆者以為著作體式也是值得注意的面向。戴溪《續讀詩記》雖說是延續《讀詩記》而來，但他選擇了與《讀詩記》完全不同的體式，這就注定了兩書的解經取向必然有所差異。《詩經》的文獻體式發展到宋代是一個高峰，宋代以前解《詩》的體式較固定，基本上沿用傳、箋、注、疏的模式。但是宋代的學者勇於創新，不再以傳統的解經模式為滿足，紛紛自創體例。從現有留存的著作中，大約可以分為十餘種不同的體式。³⁷從上舉戴溪之前的鄭樵、王質，到與他時代相近的嚴粲，彼此之間的著書體式都不同，也因此造成詮解結果的分歧。呂祖謙與嚴粲之作都屬集解體，所以對傳統注疏的成果保留較多，也採取尊重的態度。至於鄭樵則用論說的方式，針對有爭議的問題作辨析，顯現出其強烈的主觀性，且不必注意細部的字詞訓詁，甚至訓詁之說只是他在詮解《詩》文之路上的手段，並非目的，所以自然不再重要。王質甚至自創體例，總聞體表現出他解《詩》的雄心，欲以此一體式包攬三百篇所有的問題，可惜所得出的結果並不盡如人意。更重要的是，《詩序》之說與毛《傳》、鄭《箋》都在這種體式之下紛紛被王質刻意忽視。至於戴溪則採用了與呂祖謙不同的體式來解《詩》，他用近似於講章體而實為論說體的方式講述三百篇。作為講章體，戴氏為了向太子講解《詩經》的大義章旨，必須對繁瑣的詩詞名物訓詁作裁剪，甚至直接棄而不論，只作詩旨的發揮、聯想。戴書若要公開問世，他就必須對所有讀者負責，於是，面對千餘年前權威的《詩序》，以及當代的名著《讀詩記》，戴溪選擇另外一種詮釋策略，此一詮釋策略就表現在新的體式——論說體上面。雖然戴溪無法盡脫《詩序》與《讀詩記》的影響，有67.79%的比率與舊說相同，但戴溪卻從詮釋的方法上掙脫《序》說的糾纏。所以筆者可以這樣說，《續讀詩記》中的「新」成分表現在其詮釋的方法、策略上，而不是內容。當然，著書的體式只是互文情境中橫向軸的一個項目，左右《續讀詩記》這一文本的形成，其因素很多，根據美國的喬納森·卡勒（Culler, Jonathan D., 1944-）對

³⁷ 詳郝桂敏：《宋代詩經文獻研究》，頁189-223。按：郝氏將宋代《詩經》主要著書體式分為集解體、集傳體、纂集體、總聞體、論說體、講章體、講義體、校勘體、圖解體九種，但書內所述，其實還包含通釋體、博物體、目錄體、輯佚體、音義體等五種。

互文性的理解，解讀文本時有兩點需要注意的事項：一是文本與文本之間存在的可驗證的有機聯繫；二是文本與文本之外社會意指實踐活動的多方面關係：

互文性有雙重焦點。一方面，它喚起我們注意先前文本的重要性，它認為文本自主性是一個誤導的概念，一部作品之所以有意義，僅僅是因為某些東西先前就已被寫到了。然而就互文性強調可理解性、強調意義而言，它導致我們把先前的文本考慮為一種代碼的貢獻，這種代碼使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有各種不同的效果。這種互文性與其說是指一部作品與特定前文本的關係，不如說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種文化與空間之中的參與，一個文本與各種語言或一種文化表意實踐之間的關係，以及該文本與為它表達出各種文化的種種可能性的那些文本之間的關係。因此，這樣的文本研究並非如同傳統看法所認為的那樣，是對來源和影響的研究；它的網撒的更大，它包括了無名話語的實踐，無法追溯來源的代碼，這些代碼使得後來文本的表意實踐成為可能。³⁸

卡勒將「互文性」放大到了一個文本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於是文本與文化之間各種參與、實踐等互動滲透都成為研究互文的重要途徑。卡勒從符號的角度來詮釋互文，雖然不免將互文的範圍推拓至極大，但互文性閱讀理論與傳統重視文本來源、影響等考據學式的研究法之不同，在他那裡確實說得頗為明確。筆者雖非從文化的角度來說明戴溪《續讀詩記》的特點，但從橫向、共時的時代學術風尚來看，《續讀詩記》確實接受了當時新學派解《詩》的方式，因而表現出與呂祖謙《讀詩記》的內外差異。甚至，戴溪若不在書名上標示得如此直接，恐怕無人會將之與《讀詩記》相提並論。

如果說橫向軸的文本——社會關係——重在說明文本形成的過程，那麼重視讀者（詮釋者）的作用，便是互文性觀點強調的讀者接受，以及對文本意義的理解。這種論點和解構主義（deconstructivism）的文本觀有絕對的關係。解構的互文觀念突出了讀者在溝通文本間及文本與社會關聯過程中的重要性，文本潛在意義能否釋放就在於讀者本身語言能力和文學能力如何，讀者成了理解文本的關鍵。他們將文本視為一種開放的空間而不是獨白（monologue），「在文本之上的讀者和作者，一種社會、歷史與另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文本與生產文本進行對話，創造出新的文本，使文本多聲化。」³⁹這個觀念和德國詮釋學（hermeneutics）大師加達默爾（Gadamer, Hans-Georg, 1900-2002）從對話的關

³⁸ [美] 喬納森·卡勒：《符號的追尋》，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81年，頁103-104，轉引自黃念然：〈當代西方文論中的互文性理論〉，《外國文學研究》第83期（1999年11月），頁17。

³⁹ [日] 西川直子（1942-）著，王青等譯：《克里斯托娃：多元邏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358-359。

係論理解的重要性極為相似：「流傳物並不只是一種我們通過經驗所認識和支配的事件，而是語言。也就是說，流傳物像一個『你』那樣自行講話。一個『你』不是對象，而是與我們發生關係……流傳物是一個真正的交往伙伴，我們與它的伙伴關係，正如我和我的關係。」⁴⁰這種「我」與「你」的關係就是一種交流和對話關係，這也決定了意義必然是動態變化的。作為一個《毛詩》讀者，戴溪顯然忠誠度不夠，所謂「忠誠」意指他對於傳統舊說的遵從，戴氏對於毛《傳》、鄭《箋》並不重視，其解題與《詩序》相比，也有約32%的相異程度。不過，戴溪雖然不算是《毛詩》的忠實讀者，卻可能是一個「稱職」的讀者。對於《詩序》而言，戴溪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他對詩旨的創新之說，而是他對《詩序》的解放。戴溪面對《詩序》，作出的是減少美刺、去除特定時代背景、人物的刻板之說，由此可以見出他勇於自立的態度。另外，在解說詩文的過程中，他所表現出的主觀性之強烈，也讓人印象深刻。雖然有許多訓解犯了望文生義、聯想增出的毛病，但是就一個讀者接受的角度而言，戴溪無疑是一個角色鮮明的創造者，他在文本的叢林裡走出屬於他自己的路，不重蹈前人所留下的足跡，勇往直前。

肆、結語

文本不是一個自足的封閉實體的傳統，根據互文性概念，任何文本都受到讀者已經閱讀的其他文本及讀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影響，每個文本都存在於與其他文本的關係之中，多種文本可以視為一個互聯網，文本總是與某個或某些前文本（pre-text）有所交織，所以我們在這裡未必要指出戴溪的《續讀詩記》究竟是受到哪一特定文本的直接影響，而是要檢驗出戴書與哪一或哪些前文本糾纏在一起，包括吸收與破壞。

透過互文向度，《續讀詩記》的讀者可以看到創作主體——戴溪——在身份上的二重性，一方面他是《續讀詩記》的創造者，另一方面他同時又是三百篇的讀者。這種二重性在戴溪身上同時存在，又相互作用。作為一個讀者，戴溪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他的個人經歷以及閱讀過的文本不可能與三百篇的作者完全一致，因此，在讀者的互文性語境下，詩篇意旨往往能得到新的闡釋。作為一個作者，當戴溪看到前輩諸人對於三百篇的詮釋成果已如此豐碩，自己似乎無法再作出截然不同的詮解，於是在面對呂祖謙《讀詩記》這樣的稱譽士林的經典之作時，他採取了與《讀詩記》完全不同的策略，接受當時學術界流行的風尚，以新的治學觀點與詮釋方法解《詩》，得出了與《讀詩記》風貌迥異的續作。

從互文性的觀點來審視《續讀詩記》，我們看到了影響戴溪的釋義因素不少，而這

⁴⁰ 加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頁136。

其中共時性的文化背景、宋代特有的學術風氣尤其明顯。相較之下，綜貫軸的《詩經》文化背景，那些從西漢時期的釋義成果，一路下來直到宋代呂祖謙的《讀詩記》，千餘年來的傳統資產，並沒有被戴溪在詮釋的路途中所倚重。不過，假若我們因此而將戴溪歸入宋代「新派」的說《詩》陣營中，也難免讓人不安，因為《續讀詩記》依然是以探索詩中蘊藏的聖人深意為依歸，不以字詞訓詁為務；固然修正了《詩序》的局部論調，卻又有近七成的詩篇解讀向《序》說靠攏；由此可見，戴溪在新舊兩派中遊走，《續讀詩記》的解詩過程與精神有新化的傾向，解詩心態與結果又純屬「舊派」產物。因此，當我們判定《續讀詩記》是「新派」著作時，必須補一句「新中帶舊」；而當我們判定它是「舊派」著作時，又必須補一句「舊中帶新」。唯有如此，才能合乎歷史事實。

The use of intertextuality theory to explain Dai Qi Xu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the focus of discourse is the compare level and impact level

Huang Chung-S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Southern Song Lu Zu-Qian's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is The Book of Songs study history of the well-known works, this book is classifie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reface book. Dai Qi of Lu Zu-Qian's later, he has the Xu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From Dai Qi to observe the title, this book should be an extension of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the overall qualitative and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should be not very different. However, the actual view Xu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but Dai Qi can be found in the writing style and explanation of the method and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is very different. If the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Xu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together classified as a Song explained, The Book of Songs, the traditional school of thought, such an interpretation with the real situation is different. In this paper, the use of Western academic concept of intertextuality to explain the Xu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by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of "pre-text" of the impact, pointing out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Xu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tend to show the new school, it has been the main impact of the new Song style of study. Traditional HAN study impact on its books. But the river is still wearing The Book of Songs in the deep explor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saints as the focus, so this article should be Xu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the new style of study with the traditional style of study for a basic description.

Key words: Lu Zu-Qian,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Dai Qi, Xu Lu Shi Jia Shu Dou Shi Ji, intertextuality